

美学的革命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 (Aleš Erjavec) 访谈录

■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邵瑜莲；王杰；于琦

(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哲学所 上海交大人文学院)

【内容摘要】2012年5月23至5月25日，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应邀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学，期间，人文学院院长王杰教授及人文学院博士后邵瑜莲副教授和于琦副教授对阿列西就当今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访谈。主要谈到后现代主义，他欣赏利奥塔的美学观点“美学艺术是先经历后现代时期的”，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诞生之前而不是现代主义诞生之后”；谈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彼得·伯格的主要美学观；谈到世界美学的几次革命：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俄罗斯结构主义、法国环境主义运动等；也谈及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与美学革命无关。阿列西先生对中国美学的发展非常熟悉，认为中国的现代美学如果能哲学地反映近现代的中国艺术，也同样可以辉煌，而且只有中国的理论家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另外，他高度赞扬《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工作，认为是对世界美学的重要补充。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 (Aleš Erjavec)，国际著名美学家，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哲学所研究员兼卢布尔雅那大学教授。曾任斯洛文尼亚美学学会主席 (1984—1999)，国际美学协会主席 (1998—2001，第十四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委。

邵瑜莲，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学、电影学研究。

王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编。

于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化与比较诗学研究。

王杰（以下简称王）：您好！阿列西先生，非常荣幸能够采访您。您的新书《后现代主义和后社会主义之现状》在中国台湾出版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本十分重要的书，请您先谈谈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及其中的主要观点。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以下简称阿）：很高兴接受您的访谈，也很乐意和您一起分享我的这本书。在1993—1994年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之前读到一本名叫《印第安纳》的书，其中描述了关于20世纪80年代斯洛文尼亚的政治、艺术及生存状态。当时斯洛文尼亚的政治给艺术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碰巧有一天我与一位中国教授一起用餐，席间谈到这本书，他也对这本书青睐有加。他表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同斯洛文尼亚在社会、文化、艺术上有很多共同点。我们一拍即合，便开始对这一课题展开研究。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包括古巴、匈牙利、俄罗斯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共同之处。于是我们召集了业内最权威的学者对不同国别进行了个案研究，于是就有了这本书。此书最早发表于2003年，并于2009年在台北发行。这本书描述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后社会主义”时期转型中所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在这本书看来，当时的艺术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见，也是对政治体制的一种体现与诠释。

邵瑜莲（以下简称邵）：很感谢您如此详细地介绍了这本书。您提出的“后社会主义”一词很有意思，“后社会主义”可能是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连接的一种时代背景，请您就这一问题展开谈谈。

阿：首先，我们为什么称它为“后社会主义”？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比较松动，社会气氛相对自由、活跃。此时的政治控制相对宽松；文化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蕴含着各种可能。群众意识到之前的“唯权主义”已经日落西山了，走资本主义或是集权主义道路都有可能。比如说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有人就将国旗中象征着共产国际的五角星挖去，留下一个空白。这象征着任何合适的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将其替代，填补空白，现在很少再有人去关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了。

王：您的观点很有启发性，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当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

阿：我之前去过古巴，那里对外国人和本国人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方法和体制，我对这点很反对。现在有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了。但我还是认为进行一种新的社会体制改革才是改变现状的有效途径。有些急功近利者（这样的人不乏其数）认为，只要通过极端的革命或是社会运动来推翻原政体而建立起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我认为这是不可行的。你看看现在的

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他们的经济一落千丈，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单纯运用革命手段是治标不治本的。

邵：您在演讲中重点讨论的是阿多诺，并且借助了本雅明和伯格尔的视角。阿多诺当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和美学家，思想非常丰富和深邃，但您专门讨论他，有什么特别的考虑？或者说在众多美学家当中，为什么选中了他而不是别人？仅仅因为他的美学观比较特别吗？

阿：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极为特殊与杰出的一员，他在分析、批判、美学评论及作品选择上都极富个人倾向，而在社会、政治、历史及地理等领域研究都与普遍的价值观接轨。此外，如果我们摈弃他的一些过于挑剔和诋毁性的观点，他的论点及理论性和批判性的立场都能够应用到最近的艺术上，而这起初被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毫无疑问，这项工作需要用到“否定辩证”的一些方法。

于琦（以下简称于）：很多人包括艺术家在内都质疑美学是自说自话，阿多诺对此作出了有力的回应，他指出美学并非解释艺术当中有什么，而是明确其相对其他事物的不可通约的东西，也就是指出艺术的本真特性。这确实是很具有说服力的。

阿：是的，确实是这样。

邵：阿多诺与本雅明，中国学者相对比较熟悉，他们的许多著作已被译成中文，但对彼得·伯格尔（Peter Burger）大家还比较陌生，您能否详细谈一下他主要有哪些理论思考？他与阿多诺、本雅明主要都处在现代性视域中吗？

阿：我很高兴能够将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作者们介绍到中国。简单地介绍下彼得·伯格尔：1974年，伯格尔出版了《先锋派理论》一书。在书中，他用“历史性”先锋派代替了“经典”先锋派的概念，用这种方式重设了“一战”中先锋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像“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些艺术先锋派都试图缩小艺术和“人生”之间的距离。他们没能实现这一理想，因而转向了一种名为艺术的体制，转向了艺术的“自主性”领域。然而艺术先锋派们却没有气馁——在“二战”后兴起的像“激浪派”、“新达达派”、“抽象表现主义”等，以及伯格尔所说的“新先锋派”们，都把失败作为起点，但他们并未涉足“人生”，而是继续停留在自主艺术及其体制的传统框架之中。伯格尔所宣扬的这种思想受到美国的一些左翼批评家（如本杰明·布克勒）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伯格尔是在诋毁美国的“新先锋派”，在他们看来，“新先锋派”是一种极端的批判的推动力。这些争论还在持续，最后伯格尔理论被认为是先锋艺术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后先锋艺术”——不再极端而接近于后现代艺术。值得一提的是，先锋艺术被称作20世纪西方艺术的动力，而伯格尔对此做出了持续而系统的解读。

邵：伯格尔对先锋理论的理解非常引人入胜，他分析指出，历史上的先锋

派不只是起到反对因循守旧的作用，而是从根本上把艺术与人文置入“存在性”的状态，转换成乌托邦事件。这真是一个深刻的洞见！

于：相对于阿多诺，本雅明的理论多少有些超前，以致他不被同时代人所充分理解。但在他去世后，他曾经的理论思考又变得重要起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和讨论。这应该是很值得思索的现象。您提到的利奥塔的艺术观很有意思：他认为不能被充分理解的艺术都是后现代的，而一旦它具备艺术品的参数、被广为认可，它就失去了其“事件性”和“崇高性”，沦为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您如何看待他对现代与后现代的这种理解，是不是过于宽泛了？

阿：利奥塔是现代主义艺术哲学家，他认为“崇高性”是艺术的主要特性。但是现实却很复杂，因为他在80年代提出过美学艺术是先经历后现代时期的，也就是说“美学”（新的艺术总是试图得到“艺术”的称谓）只有它达到这种位置（能够被称作艺术），它才变成“现代”而成为艺术史、艺术馆或美术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一旦作品现代化了，它也就不再是美学的了，而是变成传统的一部分。

邵：根据您的分析，当代的艺术不再提供真理，而只提供意义。所以艺术更大程度上成了商品，艺术与内容及形式的关系，艺术与个人及社会的关系已基本无涉。对此您能否再展开来谈谈？您的文章《美学的革命》曾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3卷第1期上，您认为美学革命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革命？您对世界美学的历史进程非常了解，请谈谈西方美学经历怎样的美学历程，有过哪些不同的美学形态，发生了哪些美学革命？

阿：确切地说，在我看来，现在很多的西方艺术已经变成了商品从而失去原有的颠覆性、批判性和对抗性等特点。艺术商品化的一种途径就是“先锋派”（是阿多诺、格林伯格或“历史”先锋派意义上的）。一旦艺术家成为政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他/她就不再具有对抗者的形象了，而成为了政府的一名雇工（在欧盟，艺术家每月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工资就是一个例子）。其后果便是艺术重要性的萎缩——艺术终结论便是一种体现方式。现在，无论好坏，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不久，新自由社会的内部矛盾将会出现，而艺术就是揭露和记录这些矛盾的最好方法之一。我想这种情况在欧洲已经出现了。

至于美学革命，革命是存在方式深刻而本质的转变。我想20世纪的先锋运动可以称作革命：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俄罗斯结构主义、法国环境主义运动等，他们不仅仅是在进行艺术革命（立体派或表现主义也是这样），即限于艺术的革命，而且试图拓宽它们的疆域，构筑艺术与“人生”的桥梁。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些能够到达这一标准，因此可以称之为“美学”革命。

当然，“美学革命”和“美学”的哲学准则并无联系，所谓“美学”在现今只是理论知识的一种形式（艺术的哲学），用来理解这些过程。

邵：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您认为中国美学有没有发生美学革命，如果有，

请具体谈谈。

阿：我现在还不能很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把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一场“美学革命”。但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把1979—1989年间中国经历的艺术事件看作是“美学革命”，因为在这期间一些中国的艺术家试图延续“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动力，只有在那时艺术家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在从事艺术研究。关于美学历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是否只把美学革命限定在20世纪。我个人觉得这种限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或产生社会对立等这些“可能性状况”，都是美学革命爆发的条件。

邵：您对中国美学革命的理解非常精彩，也很有启发性。下面请您谈谈，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阿：如果我们用黑格尔的理论来解读“美学”的话，即美学是艺术哲学，那么，中国的美学是世界美学的一部分。它主要有三个阶段：1. 熟悉外来理论的初级阶段，“第一次接触”，所以经常性的彼此产生误解。2. 同化阶段，对外来理论的翻译（直译或者意译）及吸收。比如，既然中国的艺术方兴未艾，如何理解“艺术的终结”这一概念呢？3. 外来理论的实际应用（结合本土理论）阶段，包括艺术的应用。在这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本土艺术家发展自身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中国的美学状况更为复杂，因为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儒学和佛学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独有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关于中国现代美学，我想仍然是遵循刚刚提到的三个阶段的。现在的一些中国美学家如高建平、王杰、彭锋、王柯平等都成功地继承并发展了早期的美学家们如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宗白华等人的美学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每一个美学理论成就都离不开学术机构的支持：像大学、专业组织、出版社等，而中国美学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些机构的帮助。

邵：您对中国美学的划分很有见地，非常感谢您对中国美学如此谙熟。您在《美学的革命》中谈到，美学的革命往往同政治的革命扭结在一起，在一定历史时期，艺术会变成政治，而政治则会变成艺术，请您谈谈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如此紧密，与康德所提出的“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现代美学观是否相矛盾？

阿：中国的近现代艺术在很多方面都在重复着前苏联一些国家的艺术道路，包括俄罗斯在内。但因为没有像它们一样的政治化，所以中国的近现代艺术承受的政治批判也相对较轻。然而，尽管它事实上已经高度美学化了，但仍然不断地暗传着政治信息。这与康德的现代美学观点正好相契合，尽管事实是，为了艺术的目的，艺术常常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沿用着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艺术所建立的理念。

邵：大众文化伴随着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而产生，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大众文化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您如何看待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否也引起了美学的革命？

阿：大众文化尽管被用于商业目的，但与美学革命无关。北京的 798 艺术区就是最好的说明，我曾在十年前和冷林馆长参观过那里，当时它的存在只是试图拥有这种特征的一种尝试。众所周知，这个艺术区现已被咖啡厅以及各种商业美术馆所占领，这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对，它的存在只是单纯地向人们展示文化吸收融合的历史进程。现如今，另一幕故事正在中国上演，就如徐州（或许是中国其他城市）已经完全商业化，而缺失了像北京所拥有的那些具有美学性的地方或事物。我们不当排斥大众文化：我们都在消费而并没有人强迫我们这样做。这当然与纯艺术有差距。只有在我们的能动性被虚幻的假想与空想所代替，投机成为快乐的源泉以及活得像行尸走肉时，大众文化才成为一个问题。

邵：生态美学是当今一个比较流行的概念，您认为生态美学是不是也引发了美学的革命，生态美学是不是未来美学的方向？

阿：生态美学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常说环境美学（芬兰和美国的同事们在进行着研究），谈及与艺术和我们周遭所联系着的生态问题，我们涉及 J. J. Gibson 提出的“视知觉的生态学方法”和“生态心理学”问题。

我们也常常说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这一过程的社会政治后果。就我理解，生态的概念是与全球经济、文化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后果息息相关的。我会非常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生态学的本质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兴起，它与马克思主义以及我们的文明之间的关系等。

王：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您认为，目前中国美学存在哪些问题？您能否给出一些建议？另外，对我们的杂志《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意见和好的建议。

阿：与其他国家的美学相比，我并不认为现在的中国美学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认为美学（艺术哲学）与现代艺术实际以及世界现代文化的紧密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所有伟大的美学思想——康德的“崇高性”，黑格尔的“浪漫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阿多诺的理论都是与他们当时的艺术实际息息相关的。中国的现代美学也同样可以如此辉煌，如果它其中的一部分能哲学地反映近现代的中国艺术。只有中国的理论家能完成这一使命，认为美国的作家能够很深刻地描写中国或是斯洛文尼亚的文化是不对的，即使可以的话也是在我和我的环境清晰地表明我们自己的视角、立场和观点之后，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这个刊物是对世界美学的重要补充，也是探讨哲学、美学、文化的另一个平台，同时也得到了国际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这本期刊恰好与当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时出现，就如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恰逢乱世而达到鼎盛一样。中国对于世界美学的巨大贡献不言而喻，特别是在当下，我们和中国一起“同命相连”，越是乱世越能体现艺术的价值，就如雅克·朗西埃说的：艺术“重铸智慧”，它如今体现出来的价值远大于大众文化。在我看来，艺术对社会及政治事件的预见力远超过社会科学。艺术对于社会科学就像石蕊试纸一般可靠，预测着社会政治的未来进程：是艺术而不是科学宣布柏林墙的倒塌；是艺术家们在投身 20 世纪末的“中国先锋文化运动”从而反映出中国的社会变迁。不幸的是那时没有敏锐的美学家或哲学家察觉到它们并将其理论化。

王：非常感谢阿列西·阿尔雅维奇教授对我们刊物如此高的评价，也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您对世界美学革命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和启发。谢谢！

邵、于：谢谢！

阿：谢谢！

（本次访谈受阿列西先生及人文学院外事秘书何屹峰鼎力相助，特别表示感谢！）

（本文责任编辑：任天）

Performative Language, Politics and Poetic Allusion in Geoffrey Hill's "A Précis or Memorandum of Civil Power"

■ Thomas Day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Abstracts:

Taking Hill's poem on John Cornford as a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formative Language, Politics and Poetic Allusion in Geoffrey Hill's "A Précis or Memorandum of Civil Power". The author argue that although modern poem does not achieve the identity between the speech and act it can exercise its effect on civil power and political matters by using poetic allusion.

Keywords:

Geoffrey Hill, Performative Language, Poem, Civil Power

Material, Technique and Modern Art:An Interview with John Baldwin

■ John Baldwin, Wang Jie ,Ma Haili

(Chelsea Art Club, UK;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University of Leeds, UK)

Abstracts:

A famous contemporary British painter, John Baldwin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material and craftsmanship in painting.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John Baldwin, Professor Wang Jie discussed with him a wide range of questions like his personal artistic career, Marx's influence on his conception of painting, his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art and his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 and high—tech to his color formation.

Keywords:

technique, material, color, modern art, uncontrollability

Revolution in Aesthetics:A Dialogue with Aleš Erjavec

■ Aleš Erjavec , Shao Yulian, Wang Jie and Yu Q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lovenia Academy of
Science and Art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s:

Upon invitation, Aleš Erjavec, ex-Chairman of 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aesthetics, lectured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During his lecture tour, Professor Wang Jie, also Dean of the School, Associate Professor Shao Yulian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Yu Qi had an in-depth dialogue with Aleš Erjavec on a series of important issues concerning aesthetics. Aleš Erjavec approved of Leotard's view that "aesthetics first went through the postmodern stage." He claimed that "postmodernism came into being before modernism." The dialogue also touched upon Adorno and Peter Burger,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School of Frankfurt, and their aesthetic views and upon the several major revolutions in aesthetics like futurism, surrealism, Russian structuralism, and French environmentalism. In terms of popular culture, they all agree that popular cultur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esthetic revolutions. Well informed of Chinese aesthetics, Aleš Erjavec believed that Chinese aesthetics can also thrive as long as it makes a philosophic reflection on Chinese art of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He believed that only Chinese theoreticians can accomplish this great task. At last, he spoke highly of the effort made by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because it i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world aesthetics.

Keywords:

aesthetics, revolution, contemporary,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Another Look at the "Road of Farmers and Workers" in Yanan Talk

■ Zhou Pingy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nchang University)

Abstracts:

After discussing the necessity of "for the people," "for the civil public," and "for farmers and workers," Yanan Talk finally settles on "for farmers and workers and how" for its "basic principle" and "fundamental direction". To generalize the theme and spirit of Yanan Talk with "the road of the people" and therefore replace with it "the road of farmers and workers" is unacceptable in theory. The "road of farmers and workers" of Yanan Talk is determined by its desired addressee, intended task, discourse context, and discourse position. Mao Zedong expressed his "the road of the people" mainly in his On New Democracy, not in Yanan Talk. In theor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oad of farmers and workers" and "the road of the people" equa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ism" and "new democracy", which is ultimately decided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ithin the Party" and "without the Party", "Party spirit" and "people